科学导报
2025年11月6日 星期四
责编：赵彩娥
投稿：kxdbnews@163.com

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

■ 杨爱妍

“三三制”政权是以民主原则为核心构建的具有统一战线属性的政权形态，其制度设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与多党派合作和政治参与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不仅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更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先河。三者有机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多年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历史经验，以及对“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再考察，从历史逻辑角度来分析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如何在延安时期“三三制”的民主实践中发展。

一、“三三制”的提出：争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民族矛盾，中共强调抗战救国是第一要务，要集中一切力量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针对国民党的专制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政权建设，即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一制度设计在形式上限制了党员数量，但实质上依旧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党对决策是有最终决定权的，并创造性地将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等中间势力纳入抗日民主政权，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党外人士在政权中的实际参与，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效率，增强了政策的社会接受度，缓解了根据地内部的政治紧张。“三三制”既保障了中共的政治领导权，又通过吸纳非共产党员参与政权，扩大了政治合法性基础，巩固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核心地位。

“三三制”所产生的协商民主使得政策实践能够有效整合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平衡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这种利益整合不仅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通过实际成效增强了政权的凝聚力，巩固了党的领导，使得各阶层力量紧紧凝聚在党的周围，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二、“三三制”的实施：政治动员、统一战线和民主相结合

党领导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必须团结各抗日阶级，动员广大的农民群众积极参与。“三三制”的制度设计使得各抗日阶层的利益得到合理调节，像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经济政策，既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权益，又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对于根据地民众来说，“三三制” 政权让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尊重不同意见、广泛吸纳各方力量的决心。这种民主的政权运作方式使民众更加信任和支持共产党的领导，提高了政权的合法性和公信力。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具有充分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他们的参与能够增强政权的进步性和代表性；中间派则在根据地社会环境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他们的加入可以使政权更具包容性和亲和力。通过“三三制”的制度设计将各阶层群众转化为政治参与者，明确提出只要满十八岁，不论男女不论阶层等都可参与选举，并针对群众存在不识字、不会写等情况采用“豆选法”“票选法”等适宜的民主选举新实践，群众能够选出自己满意的代表，代表敢于在会议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农民群众真正地亲身感受到自己是可以参与政治的，边区政府也能真正知道群众关心的问题、知道政策实施的情况。

在坚持党的领导要求下，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方式应该是民主的。民主制度的规范合理加强了党的政权的合法性。陕甘宁边区是实施“三三制”原则的示范区，各抗日根据地在陕甘宁边区的影响和推动下都分别进行政权的民主选举，修改了原先政权内人员分布比例不符合“三三制”要求的问题，使民主政治得到不同程度的推广和实施，其根本性质仍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体。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是通过科学的决策机制与民主的政治实践，通过协商凝聚社会共识，更好地坚持并发展统一战线，来实现自身执政的合法性。

三、“三三制”的关键问题及解决：协商民主

在“三三制”政权推行初期，中共虽将非党人士纳入政权体系，但实践中非党人士名义参与和实际权力矛盾逐渐凸显，存在部分党内人员不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等问题。从政权结构层面来看，“三三制” 打破原有的政权人员构成模式，非党人士大量进入政权。但在传统观念和工作习惯影响下，部分党内同志对非党人士参与政权存在偏见，担心他们不能真正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很难给予非党人士充分的信任和权力。这就导致非党人士在政权中虽然有职位，但实际权力难以落实。为化解上述矛盾，中央开始推行党外人士座谈会、大小一揽子会制度。194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非党人士座谈会，李鼎铭、柳湜、霍子乐、贺连城等党外人士参加。座谈会主要是向非党人士通报高干会及内容，毛泽东批示，以后可定期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听取意见。陕甘宁边区各地都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成为边区发扬民主的新形式，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提出，从制度上保证了非党人士参与政事的实效性。

党外人士座谈会是民主协商的重要形式。它为共产党与非党人士提供了一个平等沟通的平台。座谈会大力发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政府听取党外人士对政府各项工作的意见，作为制定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参考。甘泉子长的党外人士也指出过某些乡村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些乡村干部就怕群众发表意见，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怕麻烦，这种现象很不好”。像子长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瓦市的杨汉卿提议修通瓦市到延安的汽车道路，便利瓦市到延安的交通，也能促进两地交流；瓦市的雷云亭还提议乡长要按期改选；李和春提议要在瓦市成立骡马大会等，座谈会讨论的议题涵盖各根据地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协商民主在各地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中不断发展，党外人士积极建言献策，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政府对于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都表示会积极采纳，党外人士座谈会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

这种合作关系为非党人士在政权中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奠定了基础，非党人士 “有职有权”推动“三三制”政权的健康运行，更有效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党外人士座谈会促进共产党与非党人士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党外人士在这些过程中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真诚。在会议交流中，双方消除误解，增进感情，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各抗日阶层的代表在座谈会的协商过程中，加深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与非党人士面对面交流，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了解他们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对各民众团体的思想进行不断交流。同时也能够向非党人士宣传党的政策和工作部署，增进他们对党的理解和支持。党外人士的有职有权让人民群众更加信赖共产党，也能鼓励其他普通的民众参与到边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有效扩大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主动推动构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格局，依托民主协商机制有效地整合各民族团体及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既保证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又将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等中间势力纳入政权体系，构建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三三制”框架内通过民主协商、政策沟通与利益协调，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各阶层共识，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其蕴含的民主协商、合作共治理念，实质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原始雏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既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传统政治的机械延续，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制度创新与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党的领导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提供政治大政方针上的引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三者有机结合推动“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成为民主政治建设历史中宝贵的独特的经验财富。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用大别山红色文化涵养斗争精神

■ 王旭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党同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抚今追昔，斗争精神是党克敌制胜的精神法宝，也是党克服艰难险阻的重要保障。大别山革命老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建党基地，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造就了28年红旗屹立不倒的历史奇迹，积淀了以大别山精神为内核的大别山红色文化，为新时代激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和不竭的精神源泉。

在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中坚定不胜不休的斗争意志。大别山精神的核心是锲而不舍的革命追求和坚韧不拔的政治定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别山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建党基地、中国革命的主要活动地、人民军队的重要诞生地、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地，从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等领导大别山地区党组织的创建，到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红四方面军的创建与四次反“围剿”、红二十五的重建与长征，再到二十八军坚持3年游击战争、中原突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大别山军民依靠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有力地推动了党的革命在全国的开展，有力地应对了国民党军发起的数次围剿，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的胜利长征，有力地坚持了革命红旗的屹立不倒，有力地支援了党的革命取得伟大转折。

在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两次革命低潮时期占据了6年的时间。分别是四方面军主力西进转移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重建，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的5年和中原突围后地方党组织组织地方游击队、便衣队，领导群众艰苦奋战的1年。正是由于大别山军民在这6年革命低潮时期的成功坚持，成就了连绵不断的大别山革命，造就了大别山精神得以铸就传承的历史基础。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大别山军民始终坚守信念，不屈不挠，先后有200余万人加入革命洪流，近百万人英勇牺牲，可谓是“家家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山埋忠魂，岭岭书丰碑”。

在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中传承顾全大局的斗争品格。为大局利益勇担重任，牺牲小我是大别山的斗争精神的内在动力。1935年7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胜利长征，鄂豫陕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根据地西征北上。临行前，军首长吴焕先、徐海东训诫全军：“这次行动，我们这几千人就是牺牲完了，也要牵制住敌人，保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北上。”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的战略举动，成功吸引和牵制了川陕边界的敌军，有力地支援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胜利北上。

1947年，刘邓大军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反攻任务，秉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的使命担当，千里跃进大别山。面对这场事关中国革命全局走向的战略任务，刘伯承、邓小平始终把是否有利于解放战争战略全局作为一切行动的准绳。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3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后来，蒋介石不得不为之感叹：对共战争已因刘邓大军对南京、芜湖前所未有的威胁而进入新阶段。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壮举，揭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开辟了广阔的中原解放区，为扭转整个战争形势、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中赓续开拓创新的斗争本领。善于在斗争中总结经验，不断创新升华是大别山斗争精神的鲜明特征。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鄂豫边人民从边区实际政治、军事、社会条件出发，采取了一系列符合边区社会、政治情况的政策，转战木兰山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开辟了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在长江北岸率先竖起了武装割据的旗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创新历史实践。在长期的游击战争当中，徐向前等人总结出了“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等7条战术原则，与毛泽东提出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异曲同工。红四方面军以“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为训词，在战略战术上进行了大量创新，如围点打援、“反四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等。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大别山区实际，创造性开展土地革命，形成了“大别山经验”，为党中央制定新解放区的土改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当前，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党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富于斗争精神是大别山红色文化最为鲜明的精神特质，用大别山红色文化涵养斗争精神，有助于激发全党同志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有助于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夺取新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新的伟大胜利。

基金项目：2023年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专题项目“新时代传承和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23ZT0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大别山干部学院）

红色文化引领国企党建品牌建设的策略探究

■ 张忆冬

当前红色文化逐步成为驱动国企党建品牌建设的核心动能。因此，在国企党建品牌建设的过程中，应该深入挖掘国企历史脉络中的红色印记，并逐步将“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等精神特质转化为品牌标识，从而逐步在现代治理与历史传统之间构建起良好的文化桥梁，以便逐步增强国企品牌的文化竞争力。

一、深挖红色内涵，强化党建经营深度融合

在以红色文化引领国企党建品牌建设的过程中，应该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内涵，逐步强化国企党建经营的深度融合。其中，通过跳出红色符号化的浅层认知，再以“溯源、提炼、转化”来深挖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全面梳理企业发展历程中与红色基因相关的历史事件、模范人物与精神传承。例如，老字号国企的红色创业史、新时代国企在重大战略任务中的攻坚故事，从而逐步提炼出 “对党忠诚、艰苦奋斗、创新实干、服务人民”等与企业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的精神内核，将红色文化从“历史记忆”转化为“精神动力源”，为党建品牌注入独特的文化辨识度。

通过逐步突破党建与经营 “两张皮”的壁垒，促使红色内涵与经营实践能够深度绑定起来。首先，在思想引领层面，将红色教育合理融入干部职工培训体系中。通过合理采取 “红色课堂+业务研讨”“红色基地研学+经营难题攻关”等模式，让红色精神转化为员工破解市场竞争、技术创新等经营难题的思维方法；其次，在管理赋能层面，把“支部建在连上”的红色传统转化为 “支部建在产业链上、项目工地上、服务窗口前”的组织模式，以党员先锋岗、红色突击队等载体攻克经营中的“卡脖子”环节，比如在重大项目建设中成立临时党支部，以红色执行力保障项目高效推进；最后，在价值导向层面，将“服务国家战略、履行社会责任”的红色使命融入企业经营目标，比如，在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国家战略中主动担当，以党建品牌的社会价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红色文化从“精神引领”到“经营实效”的闭环转化。

二、多维融入场景，推动红色经营有机结合

在红色文化引领国企党建品牌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合理创设多维融入场景，以此推动红色文化与国企经营更好地结合起来。首先，通过将红色文化与安全生产、质量管控深度绑定，合理打造“红色生产线”。通过在车间设立“党员责任区”，再以“严守纪律、精益求精”的红色精神规范操作流程，积极开展“红色标兵”质量竞赛，从而把革命先辈“零差错”的工作态度转化为产品质量管控的标准。

其次，在客户服务场景中，可将红色文化与服务升级、价值创造紧密融合。针对窗口单位、服务部门打造“红色服务驿站”，再以“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来优化服务流程，并大力推出“党员服务专员”机制，全面践行“贴心、高效、务实”的红色服务理念。例如，在能源、交通等民生领域国企中，通过借助“红色服务热线”来快速响应群众需求，再将党建品牌的服务温度转化为客户认可的口碑价值。最后，在创新发展场景中，将红色文化与技术攻关、战略转型深度联动。通过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等战略推进中，始终坚持以“与时俱进、勇担使命”的红色品格凝聚转型共识，从而让红色文化真正成为驱动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动能”，这样便能够让党建品牌建设与经营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三、构建长效标准，健全党建品牌运营体系

通过以红色文化引领国企党建品牌建设的过程中，应构建长效标准，逐步建立完善的党建品牌运营体系。首先，通过结合企业行业属性、红色基因特质，合理制定“红色党建品牌命名规范”“品牌视觉识别系统（VI）标准”，以便让品牌定位标准更加明确化，从而保证品牌形象既能体现红色文化共性，又能凸显企业个性。其次，细化运营流程标准，出台《红色党建品牌活动实施细则》。通过全面规范品牌活动的策划、执行、复盘全流程，规定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 “红色文化进班组”活动，每次活动需形成“活动记录+影像资料+员工反馈”的完整档案，以此确保品牌运营有章可循。最后，在常态化评估层面，要建立科学的品牌成效评估体系。通过合理构建“红色引领力、经营助推力、社会影响力”三维评估指标，再以党员参与度、员工红色精神认知度等指标来衡量 “红色引领力”，并将“经营助推力”与国企的生产效率提升、创新成果数量等经营数据资料联系起来，从而有效推动国企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

四、结语

总之，国企是国民经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支柱。因此，通过合理地将红色文化融入国企党建的品牌建设过程中，便能够为企业的 “根”与“魂”提供双重动力，从而逐步推动国企的政治引领与市场活力统一。同时，国企还需要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内涵，再依托红色文化来激发党组织的效能和增强国企的文化自信，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企业治理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浙江省建投交通基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刻理解“守正”推动文化创新发展

■ 乔 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强调：“坚持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在文章《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守正创新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是根本和前提，我们要在深刻理解“守正”的基础上，推动文化创新发展。

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不动摇。历史和现实也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凝聚全党团结奋斗强大精神力量、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是支撑共产党人跨越重重险滩、抵御惊涛骇浪的精神支柱，是文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永葆生机活力的根本指针。

新时代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最首要就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同时，紧密联系实际，真正把习近平文化思想转化为在文化改革发展中始终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主旋律的行动自觉，转化为推动文化建设的新理念新制度、务实有效举措和科学可行的工作方法。

守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从南湖红船的星火燎原，到新时代新征程的壮阔画卷，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矢志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宏伟目标奋勇迈进的光明前景愈发清晰可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应有之义，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既是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必然，也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政治保证。

新时代推动文化创新发展，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的根本原则，锚定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航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深挖底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坚定文化自信，从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但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验证。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了中国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现实难题，使其在中国大地牢牢扎根、开花结果。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历经数千年沉淀，蕴含着丰富的智慧与价值观念，同马克思主义在思维认知和价值追求等维度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两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

新时代推动文化创新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让信仰之光照亮文化发展新征程；另一方面要深度挖掘中华文明宝库精髓理念、创新中国道理中国经验表达形式、畅通中国智慧传播路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守的是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即历史主体立足特定时空坐标，凭借主观能动性与创新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创造出精神财富。它彰显文化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深刻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根脉、价值内核与精神标识的清醒认知和坚定自信。这一特性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心理认同、形塑着群体价值取向，滋养着情感表达的土壤。一旦文化主体性消解，将陷入身份认知迷茫、价值体系紊乱、文化传承断裂的困境，最终导致民族精神脊梁的佝偻与文化自我认同的崩塌。

新时代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又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同时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秉持开放包容，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单位：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发展与安全的良性互动

■ 余思淼

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的关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辩证关系的重要一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求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并且要求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长治久安。

一、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的关系

第一，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纵观古今，无数事迹都警示着我们失去安全，发展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为继，唯有筑牢国家安全防线，社会发展方能蹄疾步稳。安全作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不仅关联着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也关系到文化发展和生态健康等多个方面。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党和国家必须将安全作为发展的前提，在保障人民安全、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基础上，进行各领域更深层次的改革，实现现代化发展。

第二，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国家安全而言，发展就是保障安全的神兵利器。唯有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才能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力支撑，为其添砖加瓦。以国土安全为例，当经济稳步上升、物质条件充足，国家才能有雄厚的资金投入科学技术研究领域，购置国际一流水平的装备、设施，大力培育高水平、高层次人才，全力开展科技领域的创新，加强国防建设，从而提升国家军事防御能力，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的必然性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发展面临着国内需求和国际压力的挑战，并且历史经验证明了忽视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会导致严重的系统性危险，在这种形势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的关系有其必然性。

第一，国内形势要求注重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的关系。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各类矛盾、风险多发，既包括了传统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安全风险，也包括新兴网络、文化等领域的风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重视发展与安全的良性互动问题，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创新能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且必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的能力。

第二，国际局势要求注重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的关系。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传统国际秩序、国际体系面临挑战，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受到冲击，这种局势要求我们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要加强国家安全战略谋划，注重顶层设计，让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处于有利地位。此外，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日益凸显，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的逐步推进，网络攻击、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正甚嚣尘上，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兼顾守卫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加强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生态安全等领域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应对国际危险的能力。

三、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的关系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体现

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的关系在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主要体现为新发展理念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统筹兼顾。

第一，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中蕴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不仅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新发展理念将发展的目标与安全的需求紧密结合，使发展成为安全的坚实支撑，安全成为发展的可靠保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第二，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互为条件、彼此支撑的良性互动。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新发展理念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提供物质与技术支撑，而总体国家安全观保障的稳定环境则为改革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二者相互依存、双向赋能，共同构成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理论遵循与实践指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基金项目：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原则和方法论研究”（项目编号：24ZXZD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